

中共党史讲义

(内部试用)

上 册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说

为适应二年制培训班、理论班中共党史教学的需要，我们根据我校党史教学的实践经验，参照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共党史教学提纲》，吸收近年来党史研究新成果，编写了这套讲义，在内部试用。

编写中，我们力求针对党校学员特点，在系统介绍历史线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加强理论分析历史经验的总结。但由于水平所限，其中肯定有不少不当之处，希望同志们多提批评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1985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时期

(1919年5月—1923年12月) (1)

第一讲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2)

第二讲 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25)

第二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4年1月—1927年7月) (39)

第一讲 统一战线的建立, 反对国民党右派篡夺
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40)

第二讲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及其失败 (61)

第三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8月—1937年7月) (86)

第一讲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
路的开辟 (87)

第二讲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卖国
内战政策,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 (116)

第三讲 党的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135)

第四讲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49)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

(1) (1937年7月—1945年8月) (169)

(2) 第一讲 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170)

(3) 第二讲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187)

(4) 第三讲 党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199)

(5) 第四讲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210)

第五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6) (1945年8月—1949年10月) (222)

(7) 第一讲 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和准备自卫战争而斗争 (224)

(8) 第二讲 用人民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 (240)

(9) 第三讲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266)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

早年革命活动时期

(1919年5月~1923年12月)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年革命活动时期，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兴起，由旧民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并使革命走向新高涨的时期。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7月党的成立，为党的创立阶段；1921年7月到1923年12月，是党把革命推向新高涨的阶段。

学习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应领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时起就是一个新型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等问题。

第 一 讲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不是偶然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阶级基础；二是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思想理论基础。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中指出：这两个条件一旦结合起来，就开始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摆脱有产阶级剥削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完全符合这一规律的。

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经济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使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在客观上形成了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但是，资本帝国主

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变中国为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所以，他们极力扶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利用它作工具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阻止和扼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使中国长期停留在半封建社会状态。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不仅长期保留，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显著地位，造成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

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用战争打败腐败的清朝政府之后，强迫中国同其签订诸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他们先是强迫中国割地赔款，开设通商口岸，把中国变成他们销售商品和掠夺原料的产地和市场，继而又取得了在中国设“租界”、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开设工厂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和经营航运等特权，从而直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政治、军事及外交大权。这样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其向中国输出商品和资本的需要，就豢养了一批洋奴买办，这些人同中国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洋务派官僚结合在一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买办阶级。这个阶级是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并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个反动阶级。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是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要求革命，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无产阶级的前身，是中国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它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是最革命的一个阶级。随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迅速扩大，以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主体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同样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迫切要求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高利贷资本的残酷压榨下，不仅要求革命，而且始终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这种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说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他们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是近代中国政治上不能进步，经济上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本任务。

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过程。哪个阶级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关键在于这个阶级能否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的国情，提出明确的革命任务，制定出彻底的革命纲领，指出革命的远大前途。1851年到186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坚持了十四年之久，建立了同清政府对峙的“天国政府”，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

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人民长期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所有这些斗争最后都失败了，没有能够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虽然人数众多，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敢于用暴力革命手段来同反动统治阶级作斗争，然而，他们因受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提不出彻底的革命纲领，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前途，因而它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有革命的要求，但由于它固有的软弱性，加之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时代，它对外既不敢彻底反帝，对内又不能彻底反封建，害怕帝国主义干涉，害怕工人、农民起来危及他们的利益。所以，它也没有勇气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于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膀上。具体的说就是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二）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军阀统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他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中国政治更加腐败。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同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对内野蛮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屠杀革命志士。袁世凯称帝失败，在全国人民讨伐声中死去以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两大派系。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控制着北洋政府的中央大权，占据着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的地盘；先后以冯国璋、曹琨、吴佩孚为头子的直系，占据着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其余各省，也都为各地军阀所盘踞。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

阎，占据着东北三省。1917年7月，广东、广西、云南的地方军阀，利用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武力统一南方，否认段祺瑞政府的合法性，继而召开非常会议，决议组织政府，从而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中国完全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你征我伐，连年混战，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在坚持斗争，但处境困难，再也难于形成规模较大的斗争。国家的出路在哪里？许多革命者忧虑彷徨。

一批不甘心辛亥革命失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针对封建主义的维护者大肆鼓吹封建主义道德观念，提倡“尊孔读经”，以巩固封建主义的统治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作阵地，同李大钊、鲁迅一起，团结一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等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对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化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陈独秀说：民主和科学若舟车之有两轮，国人若欲脱离蒙昧，羞为浅化之民，就当以民主和科学并重，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他针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抛弃君主专制的观念。李大钊在《民彝》一文中指出：民主与君主不能两立，自由与专制不能并存，自由生则专制死，专制存则自由亡。

他们鉴于袁世凯称帝和康有为反对共和制都是打着孔教的旗号，广大青年受着孔子学说的严重束缚，就在批判封建

专制制度的同时，猛烈地批判了孔教，号召青年反对旧礼教、旧道德，实行男女平等，个性解放，从而使许多被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束缚的青年开始得到了解脱。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到北大任教，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随之《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入北京，与北京的进步知识分子汇合，进一步壮大了阵容，在批判孔教的同时，又开展了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批判，他们反对封建文学，提出建设国民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等。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这时的作品。

这次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讲并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围，但是，它却在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给腐朽的封建主义以有力的冲击，对广大青年起了良好的启蒙作用，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为人们继续追求真理创造了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三）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壮大

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建立而产生、成长和壮大的。它是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物，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则不同，它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产生，伴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兴办企业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成长壮大。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它的社会基础也更强些。

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向中国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开办了一些为航海运输服务性质的企业，如修理船只的工厂和原料加工工厂等。于是

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就出现了。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封建官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仿造舰船。李鸿章在上海、苏州设立制炮局。左宗棠在福州设船政局等。到了七十年代以后，他们又创办了一批民用企业，如左宗棠在甘肃设的织呢机械厂等。这样就在封建官僚开办的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1872年华侨商人陈君源在广东南海县创设继昌隆机械缫丝厂，这是我国最早的民族工业。民族工业出现后发展缓慢，二十世纪初有所发展，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法、德、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战前中国的民族工业(包括官办的在内)，计有近代工厂六百九十八个，资本三亿三千余万元。到1919年，工厂增至一千七百五十九个，资本五亿多元。六年间，工厂数增加一倍半，资本增加百分之五十四点五；中国民族工业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大企业的数量有明显增长。1914年资本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大企业，仅占总厂数的百分之四，到1920年则增至百分之十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稍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和美国利用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及医治战争创伤的机会，趁机在华扩张了他们的经济势力。1913到1920年，日本在华的商家，由一千二百六十九家增至四千二百七十八家，增长百分之二百三十七。同期英国在华商家，由一百三十一家增至四百零九家，也增长二倍以上。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外国资本在华的扩大，中国无产阶级也发展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

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二百万人左右。

马克思认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负起消灭剥削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由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无产阶级和先进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个劳动阶级；由于大生产的劳动条件，使它成为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阶级；还由于它没有生产资料，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它最痛恨剥削制度，斗争性特别坚决。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备上述一般工人阶级的特点外，还有自身的突出特点。

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其所受剥削之残酷，在各国工人中是罕见的。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2小时以上，多的竟达18个小时。他们的工资却很微薄。致于大量童工和女工的工资则更低。这样微薄的工资，还要受到封建性的包工制、包身制的盘剥。再加上物价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下降。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恶劣，很少有劳动保护，劳动事故不断发生。1913年抚顺煤矿，一年内就发生灾害性事故二千九百一十八次，死伤工人三千一百八十四人。中外资本家对于因工致残致死的工人很少给予抚恤，有时给一点也是微不足道。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没有丝毫权利，不仅罢工是非法的，而且资本家和工头还可以肆意侮辱、打骂工人，工人稍有不满足和反抗，往往遭到军警的野蛮镇压。这样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中国工人阶级最富有战斗性。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特别集中。较多集中在铁路、航运、矿山、纺织等行业中。从地区上看，又多集中在上海、

天津、武汉、广州、青岛等沿海城市和地区；从企业规模来说，多是集中在五百人以上较大的企业中。这样的集中程度，非常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战斗，对工人运动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中国的工人是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比较了解农民受剥削的情况及其痛苦生活。他们的亲友都在农村，同农民血肉相联，便于和农民结成联盟。

再加之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阶段，因而没有工人贵族阶层，不存在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工人阶级中除个别工贼以外，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上述这些特点决定，中国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不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他们不仅为改善自身的经济待遇而斗争，而且还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早在1858年，香港二万多工人为反对英法侵占广州而举行罢工。1906年，安源曾有六千多工人参加同盟会领导的萍乡、醴陵、浏阳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辛亥革命中，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和上海等地，也有大批工人参加斗争。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人阶级的斗争还是处在自发性的经济斗争阶段，斗争的内容多是为了改善经济待遇。斗争的次数也较少。从1895年到1913年近二十年间，有记载的罢工七十余次，平均每年只有三、四次。有时参加一些政治性的斗争，也是作为资产阶级追随者的身份参加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运动有明显的发展。工

人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规模显著扩大。从1912年到1919年5月七年间，罢工达130多次，每年平均十八次还多。工人斗争开始由分散的斗争转为有组织的斗争，出现了互相支援和同盟性的罢工。如1914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的中国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同盟罢工。在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地工人一度组织过工会。斗争的政治性日益明显。1915年上海、长沙等地工人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为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罢工等，都是工人阶级独立进行政治斗争的萌芽，表明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有了提高。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的斗争总的说还没有摆脱自发的、分散的状态，还受着“会党”、“行帮”等封建组织的影响，但是，当时工人阶级已形成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且日益成长壮大起来，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自己民族解放的道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十月革命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把马列主义传入了中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国先进思想界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接受过来，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十月革命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的先进分子都是把西方的民主主义作为真理来接受的。在他们寻找和学习西方民主主义的过程中，曾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有的还片面介绍过马克思的一些经典著作。1898年梁启超提到过马克思，以后多次讲到社会主义问题，但他讲的目的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1906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书中，介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并翻译了其中的十条纲领。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天义报》上转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翻译了恩格斯1888年为该书写的序言。但是他们都同时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说社会主义就是欧洲的议会。孙中山多次讲过社会主义的问题，可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而兴起的工人运动，视为一种“祸害”，他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堵其祸害于未萌”。在辛亥革命期间，有个政客江亢虎，曾组织过“中国社会党”，并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目的是作为一个党派参加议会。这些情况说明，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也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真正作为真理接受过来。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当时的思想界的人们，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受着这种阶级的局限；另一方面，客观上还没有高涨的工人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物质力量，受着历史条件局限的缘故。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由学习西方转为学习俄

国，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表明这种转变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论述了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革命的先声，并预言马克思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的这些文章不仅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拥护十月革命的心情，同时也清楚地表明李大钊已转到了社会主义方面，并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陈独秀比李大钊转向社会主义方面较晚。长期来他一直坚持“公理战胜强权”的信条。他对内反对军阀的强权政治，对外他幻想美国总统威尔逊能在巴黎和会上主持公理，帮助取消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的主权。可是，事实教育了他，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很快破灭了。1918年12月，他同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2月，他表达了对巴黎和会的不满，指责了巴黎和会不主持公理，并转向拥护十月革命。同年4月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表明陈独秀也已经转向拥护十月革命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